

仰不愧天

白先勇 著

SPM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仰不愧天

白先勇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仰不愧天 / 白先勇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18-13333-1

I. ①仰… II. ①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5395 号

YANG BU KUI TIAN

仰不愧天

白先勇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主 编: 李怀宇

责任编辑: 李展鹏 张 静

装帧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3157 83795240 邮购: (020) 83795240



白先勇

自序：八千里路云和月

——追寻父亲的足迹

父亲白崇禧将军半生戎马，十八岁恰逢 1911 年辛亥革命，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武昌起义，三十五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马当先，直驱北京城，推倒北洋政府，最后完成北伐。全面抗战八年，父亲出任副参谋总长，重要战争，无役不与：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武汉保卫战、桂柳会战。为国为民，父亲奉献了他的一生。然而父亲的历史，长年来在两岸一直未获公平的论述与评价，甚至还时常遭到污蔑、扭曲。自从 1994 年退休以来，我便着手搜集资料，访问有关人士，预备替父亲写传，呈现父亲真实的一生，于是便有 2012 年《父亲与民国》以及 2014 年《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两部传记的出版。这两部书都由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三家出版社同步发行。《父亲与民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抢先于 2012 年 3 月出版。这部书在大陆立刻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尤其是其中有关北伐、抗战、国共内战的数百幅照片，在大陆首次露面，使新闻界十分好奇。两年间，我受到各地的邀请，展开了我八千里路巡回演讲，追寻父亲足迹的旅程。2012 年我的行程：北京—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广州—上海—杭州。翌年 2013 年，我去了西安。隔一年，更去了

东北，沈阳—四平—长春，最后返回北京。这两年，由北到南，由西到东，跑遍了中国大陆几个重要大城，而这几个城市跟父亲的戎马生涯息息相关。我马不停蹄穿梭于这些城市，向热切的听众讲解父亲的生平历史，同时也追踪父亲当年在各个城市留下的身影及事迹。

北 京

2012年4月21日，我终于在北京举办了《父亲与民国》的新书发表会。这部书能够在大陆出版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其间曾经过一年多千山万水的波折，幸而到岸。一开始，发表会地点也颇难找，很多合适的地方不愿意接。后来终于找到政协礼堂附设华宝斋书院，这是一间布置古雅的所在，有书香气。发表会下午两点钟开始，会场早坐满了各种媒体记者，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站，大概有三十多家，一些老朋友也到了场，作家章诒和、社科院文学所黎湘萍教授，还有北大、北师大一些文史教授。会上我讲述了《父亲与民国》成书的来龙去脉，更放映了一段父亲追悼会的纪录片，其中有蒋介石赴殡仪馆行礼献花的镜头，父亲的丧礼按陆军一级上将“国葬”的仪式，文武百官都到齐了，相当隆重，这是大陆媒体记者最感兴趣的影视资料。等到会后记者群访，他们抢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岸一直传闻白崇禧是蒋介石令特务毒死的，是否真实？我借着这个机会把一直以来流传着的这个谣言严正澄清。缘由是一名被国民党情治机关开除的特务谷正文捏造故事：蒋介石派特务酒中下毒，杀害父亲，并且派遣护士间谍下手云云。情节至为荒谬。第二天好几家大报的标题竟是：“白崇禧

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

我的一番澄清，引来大陆媒体强烈反应，后来台湾的媒体也有了同样的回响。出版社计算了一下，登载有关《父亲与民国》的报道的媒体，在大陆超过一百家。于是自新书发表会开始，《父亲与民国》这部书的影响力，从北京开始慢慢辐射出去。

父亲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几段特殊因缘。1928年6月8日，父亲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长驱直入北京城，6月4日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撤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政府群龙无首，国民革命军进城，北京人民夹道欢迎。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渴望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北洋政府的腐败作风，不符合人民的要求，当时北京人民对充满朝气理想的国民革命军是抱有很大期望的。至于父亲领军进北京，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第一座高峰，也可能是最高的一座，完成北伐时，父亲才三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的一位青年将领，6月11日记者访问：

“广西军队进北京，乃历史上向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

白君满面笑容，状至愉快，曰“太平天国时，两广军尝一度进抵天津，至于进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

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父亲马上英姿、顾盼自雄的神态。他在故宫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那座门上的横匾竟刻着“崇禧门”三个大字，暗合了父亲的名字，好像是北京城欢迎这位白马将军的到来。北京这座古城经历金、元、明、清、民国北洋政府，

做过八百多年的首都，人文荟萃，民国初年的新式学堂多集中在北京。6月26日，父亲应邀到北平女师大演讲，主题是“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女师大的学生都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精英阶层，父亲的演讲，主旨在鼓励妇女经济独立，入学参政，加入国民革命，父亲这一番鼓励女权运动的话，大概女师大的新女性都听得进去的。接着父亲又到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由罗家伦校长邀请。父亲领着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一时成了万人瞻仰的英雄。当时父亲年轻气盛，不懂收敛，锋芒太露，因而功高震主。同时广西军队势力高涨，蒋介石感到威胁，终于发动“蒋桂战争”，国民革命军，兄弟阋墙，国民党失去统一中国的黄金机会，埋下了最后覆亡的恶因。父亲被通缉并革去党籍，连夜仓皇离开平津，坐船潜回广西。北伐父亲立了大功，可是一夕间从巅峰跌到谷底，经历了事业上第一次大起大落。

经过十六年，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又回到了北京。10月10日，父亲以抗日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参加了北京日军受降典礼，在北京太和殿举行，由孙连仲将军主持大典。那是北京城内万众欢腾的一个日子，自从卢沟桥事变，北京城及其人民饱受日军蹂躏的痛苦，八年后终于拨云见日，父亲与北京民众都分享了胜利狂欢的一刻。

父亲最后一次到北京是1947年2月，时任国防部长，到华北视察，国共内战已经开打，北方战云密布，父亲到北京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商讨华北防卫问题。

北京是座千年古都，历尽沧桑，看过多少朝代的来来去去，英雄的起起落落。父亲每次到北京，也总在历史大转折的一刻。

南 京

2012年4月23日，我们从北京坐五小时高铁到达南京。第二天，在先锋书店有一场大型演讲及签书会。先锋书店在南京大学附近，原为停车场，改建成一家规模庞大的书店。那天演讲，以“父亲与民国”为题，外面下雨还涌进来千多听众，以年轻人为主，大概有不少学生。章诒和替我站台开场介绍，她写了一篇文章评介《父亲与民国》——《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白先勇〈父亲与民国〉读后》。诒和对父亲的历史有感而发，所以文章写得深刻苍凉。我在书店演讲了两个小时，放映多张父亲各阶段的照片，父亲的一生可说是民国史的一个缩影，讲父亲的历史也就等于讲民国史。在台上，我感受得到南京听众的热切与好奇。大概因为南京曾为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人民对民国人物、民国历史自然有一份亲切感。演讲完毕开始签书，足足签了三个钟头，近千本，书店里我的书卖得精光，我原也没有想到南京会有我这么多的读者。

第二天4月24日，才是这次南京行的重头戏，“白崇禧与近代中国”研讨会由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共同举办。这是突破性的一次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以父亲的历史为主题开研讨会，也是第一次以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主的正面客观的学术会议。而且主办单位为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研究民国史最有权威的学术机构，开会的地点就在博物馆，也就是民国政府时期的总统府，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所在，再往上溯，南京总统府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现在博物馆的陈列，大致还原民国时期的面

貌，蒋介石办公室的摆设还是保持原样。因为这个研讨会不比寻常，主办单位特别谨慎低调，原则上不欢迎媒体采访，会议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由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主持，南大教授来了不少位，资深教授有申晓云、刘俊、张生，还有江苏省党校李继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等。

我看看大礼堂的环境，感到很眼熟。《父亲与民国》里有一张照片，是1946年7月1日，蒋介石在这个礼堂里授予父亲国防部长印信时所摄，而六十六年后我却在同一个地点，参加“白崇禧与近代中国”研讨会。我突然感到：父亲本人没有机会再回到南京，但他在天之灵却指引我替他完成了这趟南京之旅。

会中学者们发言相当客观中肯，对父亲抗日战争的功劳也做了肯定。会中论到大陆一贯流行称呼民国时期地方军事领袖为“军阀”，父亲也一直被称为“桂系军阀”，我提出严正抗议，我说“军阀”是指拥有地方军队的首领，其势力仅及于地方，其利益目标也限于地方及个人，可是父亲参加武昌起义、完成北伐、抗战八年，都是全国性的，是为保卫全民族而战，而且父亲麾下指挥的不仅是桂军，也包括中央军及其他军队，他绝对不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央政府任职。与会者都表示赞同。开会的同时，在博物馆南京总统府做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照片展，有一百幅，都是从《父亲与民国》上撷取下来的，排列起来，图说了父亲一生。这些照片在大陆都是头一次露面，所以引起民众强烈的好奇，展览室就在总统府一入门的左侧，位置醒目，展期长达三个月，博物馆一天七八百人进出，父亲这个照片展的观众必定不在少数。《父亲与民国》这本书的影响，也从南京逐渐散布出去了。

第二天，我在东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东南大学前身是中央大学，蒋介石是校长。我在演讲时提到，抗日战争，父亲提出重要战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军作持久战。讲到这里，台下学生纷纷交头接耳：持久战是毛主席提倡的。我说毛泽东也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可是父亲提出好像早一些，两人大概没有互相影响。

南京城是一座历经十一朝的千年古都，因为国民政府曾在南京建都，父亲与南京的关系当然也就比较密切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同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宁汉分裂”的危机，蒋介石被迫下野，孙传芳军队乘机进逼南京，父亲自上海替革命军募款，返回南京路上，发现有孙传芳部队蠢动，父亲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指挥所，指挥中央第一军在南京近郊龙潭与孙军激战六昼夜，终于彻底击溃孙军，扭转乾坤，“龙潭之役”乃北伐史上最关键的一仗。

1937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父亲首先响应，8月4日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北伐十年后父亲再度到南京，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的一刻。父亲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负责规划抗日战略之重任，展开八年烽火连天、肝脑涂地、中国人民死亡三千万人的惨烈战争。父亲抵达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头条这样写道：

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英勇牺牲十五万，不敌日军优势炮火，终于撤退。日军进逼南京，蒋介石召开南京保卫会议，父亲及国军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等，皆主张放弃南京，宣布为不

设防城市，因为国军新败之余，来不及整军补充，南京无险可据，防守困难。蒋介石未采纳，认为南京乃国府首都不能放弃。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父亲陪唐巡视周遭防御工事。那天天气寒冷，下雪，父亲看见唐身体虚弱，满面病容，还代他爬上山察视。日军破城，唐生智弃城而逃，日军屠城，三十万军民惨遭屠戮。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人民，遭罹了震惊中外的有史以来最残酷灾难——南京大屠杀。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飞回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去中山陵谒陵，我们都跟着父亲爬上那三百级石阶，穿过“天下为公”的牌楼。父亲是在告慰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八年苦战，终于把日寇驱走，还都南京。

武 汉

2012年4月27日，我们坐高铁抵武汉。1948年底，母亲率领我们全家从南京坐船沿长江到武汉与父亲会合。那时国共内战已到最后阶段，京沪不稳，我们又开始逃难了。武汉冬天酷寒，我记得父亲汉口“剿总”司令部里，树上的老鹰被冻得坠落地上。我们坐火轮从汉口渡到武昌，滚滚长江，浊浪此起彼伏。武汉从古到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父亲时任华中“剿总”司令，坐镇武汉，严阵以待，与林彪军队即将有一场生死恶斗。六十四年后，我携带《父亲与民国》再度到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横跨在武昌与汉口，天旋地转，武汉变成了一座千万人口，到处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

我在武汉崇文书城开讲座签书，并到华中农业大学演讲“父亲与民国”，听众上千，反响强烈。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祥

地，抗战时又当过国民政府的行都，武汉的民众对民国史以及父亲的生平，热切好奇，也是很自然的了。

父亲一生的事业的确与这座有“中国的心脏”之称的战略重镇息息相关。1911年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父亲那年十八岁，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革命。参加武昌起义，父亲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从此，他的命运与民国的兴亡便紧紧绑在一起了。

1938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都到武汉，日军大举进攻武汉，父亲代理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军队与日军展开近五个月的“武汉保卫战”，这场战役，激烈迂回，双方死伤惨重，但争取了时间，让国民政府得以从容迁往陪都重庆。

十年后，1948年，父亲又回到武汉，蒋介石派遣父亲就任华中“剿总”司令。国共内战已到了对决阶段，最后决定国共胜败的淮海战役，即将登场。本来此役定由父亲指挥，父亲提出战略计划：“守江必先守淮”，指挥中心设在蚌埠，五省联防，由华中统一指挥。

蒋介石将战区一分为二，华东归刘峙指挥，在徐州另设立“剿总”。父亲警告：“华中指挥权分裂，此役必败无疑。”后淮海战役果然国民党军大败，损失六十万军队。

翌年，林彪四野破关南下，进逼武汉。此时四野已经是百万大军，又刚刚打胜辽沈战役，士气高昂，父亲武汉守军不足三十万，而且国民党军经淮海一役军心濒临崩溃，父亲与林彪再度交手，已居劣势，被迫撤离武汉，转战湖南、广西，与林彪打至最后一兵一卒。

父亲打了一辈子的仗，在武汉见证了民国的诞生，最后也在这个城市目睹了民国的衰落。

桂 林

第二轮巡回演讲，首站是桂林，回到父亲的家乡。2012年5月22日在桂林召开了“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研讨会，开会的地点就在榕湖宾馆，那原是我们桂林的故居，后改成高档宾馆，但老房子还在，那是抗战后新起的，原来那幢洋房，1944年日军攻打桂林，炸掉了。

与会的人都下榻榕湖宾馆，我每次回桂林，都差不多住在榕湖老家。1949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父亲与桂军将领就是在榕湖家中开的紧急会议，李宗仁、黄绍竑、李品仙都到了，会议决定战和，父亲极力主张战到底，后来果然父亲与林彪战到最后，父亲的军队是国民党军队最后撤离大陆的一支。六十三年后，我跟一批历史学者又来到榕湖，开会研讨20世纪30年代广西建设——那是父亲最得意的政绩，把广西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参加会议的学者有台湾来的杨维真、张力，南京大学的申晓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黎湘萍，还有几位广西当地的学者。研讨会足足开了一整天，在广西，这也是个创举。1993年广西政协本来要在南宁召开一个讨论父亲历史的会议，学者们的论文都写好了，可是当时的政治氛围还不成熟，会议临时取消，我白跑了一趟广西，不过在桂林倒吃足了日思夜想的桂林米粉。

1944年是抗战后期极为艰辛的一年，日军攻打广西，父亲负责指挥“桂柳会战”，保卫桂林。广西子弟兵保卫家乡，打得十分英勇惨烈，但军力人数远远不及日军，将士牺牲惨重，师长阚维雍自戕，八百多守军最后退入七星岩作殊死战，日军

放毒气并用火烧，八百官兵全体殉国，是广西版的“八百壮士”，桂林陷落。

我们全家以及亲戚八十余口，由母亲率领，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逃离桂林，桂林城烽烟四起，一片火海。那是桂林这座古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浩劫，整座城付之一炬。

2012年5月24日，我在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做了一场演讲，听众来了千余人，在桂林，在自己的家乡，向广西子弟讲父亲的生平，讲广西的历史，我有一种迫切感，因为现在年轻一辈的广西子弟对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不一定熟悉，至于对父亲一生的英雄事迹，恐怕也是陌生的了。但我感受得到听众的热情，他们有求知的渴望，很想知道被掩盖的那段历史。

后来我看到广西师范大学的建校史，广西师大本来是广西师专，原来是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广西主政时创校的，父亲身为军人，但最注重教育，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广西以及其他省里，创办过大、中、小各级学校。在他的故乡临桂县，他出资办过一所“东山小学”，现在还存在，是为了乡下孩子读书办的。我在桂林念过中山小学，这所纪念孙中山的小学，校史上记载，创办人赫然是白崇禧，这是我最近才发觉的。我回去参观小学母校，居然校歌都没有改，我跟小学生们一起唱：

我敬中山先生，

我爱中山学校。

重 庆

2012年5月26日我们到了重庆。我是在1944年头一次到达重庆的，那是抗战时为了逃难。这次回去，中间隔了六十八年，重庆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城市。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是一座山城，到哪里都要爬坡，我们住在李子坝，在半山腰，每次回家好像总有爬不完的阶坡。我的记忆中，重庆是一座泥色的城，长江的支流嘉陵江是泥黄色的，山坡大多是土坡，到处黄尘滚滚，连冬天的雾好像也带有土色。可是新重庆的绿化做得非常好，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因为到处铺柏油马路，可以坐车上山，山坡好像也消失了，加上四处矗立的摩天大楼，大重庆变成有三千万人口的直辖市。新旧重庆是两个城市、两个世界、两个世纪。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个悲情城市，日机不分昼夜轰炸，防空洞里闷死上千人，但重庆亦是当时中国的精神堡垒，是由这个黄泥城发布出去的作战命令，拼死抵挡住日军凶残的侵略。

父亲战时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为了躲避日机空袭，军训部设在重庆近郊璧山。璧山有一个温泉，叫西温泉，父亲与钱大钧将军共同创办了一间西温泉中小学，给政府公务员子弟就学。父亲公余，常带我们到学校的温泉游泳池游泳，我就是在西温泉学会游泳的，那年我六岁。

在重庆我做了两场演讲，一场在重庆图书馆，另一场在西西弗书店。重庆图书馆设备周详，特别为父亲做了一个资料展览，父亲有关军事方面的著作、父亲的演讲稿等等，不少早已断版的书籍，重庆图书馆保存得相当好，到底重庆抗战时期是

国民政府的陪都，还有不少国民政府留下的痕迹。我的演讲，观众踊跃，重庆人并没有忘记抗战，我讲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那天晚上，我跟家人正在院子里吃西瓜，突然间收音机传来广播员的声音：日本投降了！广播员自己先兴奋得哽咽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广播员颤抖的声音，顷刻间，整个重庆城响彻了爆竹声，足足响了一夜，那晚没有人能睡得着。讲到这里，我自己的声音也拉高了，下面的观众跟着激动起来。抗战时期四川人民的贡献很大。

广 州

2012 年 6 月，我从台北再出发到广州，19 及 21 日我在方所书店及中山大学有两场演讲，两场听众都有上千人。1949 年夏天我们全家从武汉乘粤汉铁路火车到达了广州，那时国共内战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我们暂住在新亚酒店，酒店都塞满了南下的难民，国民党军打败仗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但我居然还在培正小学读了几天书。不久，我们又开始整行李，预备逃难了，我们坐船从广州到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要等三十九年后，才能重返大陆。我出生于七七事变那一年，童年与少年，就经过两次天翻地覆的战争。

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基地，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有袁世凯称帝以及一连串北洋军阀夺权动乱，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政府，预备北伐。民国十二年（1923 年），父亲在广州晋见孙中山，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深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孙中山著作的启发，投身革命，那次在广州会见孙中